

卷首语

茶饮杂俎

董国政

椭圆形的叶子,白色的花,常绿木本植物,谓之茶。古人造字的时候,就已暗示这种植物与人类关系密切,故在草木(禾)中嵌入了一个“人”字。“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杜牧的诗句道出了中国人眼中茶的地位之尊;而以品茶论茶出名的陆羽更是进入了圣人行列,被尊为“茶圣”。其实,陆羽不过是道茶之道,神茶之神,离开了茶,何圣之有?

时下,中国的崛起吸引住了全世界的目光。要是用一件物什来比拟当今之中国,窃以为最好的东西莫过于茶。何以言之?不似咖啡的苦涩,不似可乐雪碧的飘浮,不似牛奶的醇厚,更不似醪酒的浓烈,茶之为饮品,清雅含香,提神而不生迷幻,健体而不分春秋,“入世”而不为尘累,老少咸宜。而且,可以泡之再三,一遍有一遍的味儿。窃以为,茶饮暗合了中国的崛起:不张扬,不矫饰,不外淫,很平和;外国人对中国了解愈多,印象愈深,好感亦会随之增多——这正是品茗者的感受。茶饮与经济学有什么关联?

联想一:茶被誉为[illegible]世纪的饮品,而经济学则是[illegible]世纪的显学。联想二:茶源于中国,它的发明与中医中药等众多中国发明相类,皆是伟大的发明。历史悠久的茶文化今天面临着丰富发展的问题。经济学呢?一些元问题早经由大师们提出来了,但前人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决今天的问题,创新发展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联想三:茶与水是相辅相成的,好茶需配好水。陆羽在《茶经》中论煮水方法时指出:“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西湖龙井因西子湖和“龙泓井”水而得名,用外地的水来泡西湖龙井必难出“色翠、香郁、味甘、形美”之四绝效果。经济学何尝不如是?他人的理论再好,搬到中国来也未必管用(水土不服),还是得“以我为本”,甚至于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经济学家茶座
(第 圆圆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副主编
刘德久
执行主编
詹小洪
责任编辑
董新兴
陈丹丹

【卷首语】
董国政　茶饮杂俎 辕圆园园员

【国是我见】
李海舰　解在哪里芽——求解之道 辕圆园园源
顾海兵　北京与台北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
　　比较 :圆园年的差距或 源年的滞后 辕圆园园
王松奇　我们手中的货币会不会变成贝壳？辕圆园园缘
范新宇　经济全球化走笔 辕圆园园
董国政　“和平”超万金 ,“安全”价更高 辕圆园园

【学界万象】
陆　铭　经济学界的 缘园后园苑园愿园辕圆园园
李华芳　青年经济学子不能急功近利 辕圆园园源

【学问聊斋】
黄有光　泛评《制度经济学三人谈》辕圆园园苑
王跃生　经济思维与“经济学价值”辕圆园园员
刘福寿　从“张友仁定理”说开去 辕圆园园缘
李仁君　雾里看花般的经济学方法 辕圆园园愿

【经济评论】
陈　抗　三种忠诚——也谈退出机制 辕圆园园远
许　斌　我预测了上海车牌价格 辕圆园园
陈彩虹　制度创新的力量——薪酬制度一次小小
　　的创新实践 辕圆园园
聂辉华
周雅竞　旅游业越好,教育业越差？ 辕圆园园
徐昌生　春运拥堵的源头在哪里？ 辕圆园园

【经济随笔】
蒲勇健　美、孔雀的尾巴与信号博弈
李俊慧　从《商道》中悟道
朱　玲　江苏农村医疗改革纪事（两则）
宋胜洲　空间布局的背后之手
皮建才　唐明皇的经济学
郭梓林　出版、图书与读书成本

【生活中的经济学】
姚　洋　上当与同情心
曹利群　市场化 如何测度是个问题
高明华　课堂上的博弈
邹啸鸣　对幸福征税
范合君　像经济学家一样看世界

【经济学人】
冒天启　在冶方身边重读《资本论》

【经济史话】
朱荫贵　老股票的故事（三）：大生企业股票：
　　晚清状元张謇下海办实业的见证
梁小民　走西口与晋商（四）

【他山之石】
唐宗焜　小店华诞 举国同庆
巴曙松　从格林斯潘的“不作为”谈起
詹小洪　看韩农，思华农
高广春　美国政府为证券化做了些什么？
朱铁臻　奏出生命乐章的波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总第 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ISBN
Ⅰ总… Ⅱ总… Ⅲ总经济学
原文集 Ⅳ总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第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 号
邮编
编辑部电话：
发行部电话：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年 月第 版
年 月第 次印刷
毫米 开
印张 千字
邮发代号
定价：元

解在哪里？
——求解之道

李海舰 *

自然科学领域，例如数学，“解”是指人们求方程式中未知数的值；社会科学领域，例如管理，“解”是指人们对某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或处置对策。这里，小到平民百姓，中到企业老板，大到国家元首，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求解”。就家庭而言，解的标准是幸福最大化；就企业而言，解的标准是利润最大化；就国家而言，解的标准是福利最大化。在“正向效应”最大化或“负向效应”最小化的约束条件下，如何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呢？这里，就一些规律性的“求解”范式做一探讨。

一、解的一般范式

1. 上下求解，解在上面

在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各种问题或被各种问题所困，总是抱怨找不到一种根本性的解决办案。其实，实践中的能力不足、成效不大，往往是由思想上的苍白或贫乏造成的。只要思想到位、思路正确，众多问题都可找到一种“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解决方式。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发展，可谓“思想解放”的产物。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解放思想，黄金万两”，“思想解放，万两黄金”。这里，物质突破源于思想突破。一般而言，最高层次的问题要求解于最低层次。一些问题在平面上根本“无解”，而在立体上就很容易“有解”；一些问题，在同一层级中只有“小解”，而在上一层次中可能发现“大解”。笔者认为，按照传统思维，国内关于国有资产和私有资产的争论，永远都找不到满意的答案。相反，如果提高认识层次，无论国有资产还是私有资产，它们皆属于广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在功能上对外都一样体现着中国的强大和富裕。在某一时期内，即使国有资产少了，可能国家资产根本没变；或者动态地看，即使国有资产少了，可能国家税收多了，最终还是体现了全民族利益的国家资产多了。

---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圆缓内外求解，解在外面

过去，我们总在问题本身或者问题内部“求解”，要么“无解”，要么“小解”，所以，社会发展不仅缓慢而且代价亦高。现在，我们发现，超脱问题本身或者跳出问题内部，才能找到“大解”。就宏观经济而言，关于“三农”问题，事实证明，就“三农”谈“三农”根本没有出路。也就是说，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三农”本身，“三农”问题的“根本解”不在“三农”领域。现在，我们已认识到：只有搞城市化、工业化，“三农”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铲除”，亦即跳出“三农”发展“三农”。就中观经济而言，温州已从“温州经济”发展到了“温州人经济”熏即在温州之外还有一个“温州”，它比温州本土发展还要厉害得很。也就是说，今后温州的大发展在温州内已没有解；其思路是：跳出温州发展温州。由此推之，就浙江而言，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就中国而言，跳出中国发展中国。再如，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就外贸发展外贸”的路子，今后应转向走“跳出外贸发展外贸”的路子，这样才能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上做大外贸、做强外贸。就微观经济而言，起初阶段，就企业做企业；但要做大企业、做强企业、做久企业，则必须是“跳出企业做企业”。一般而言，就粤做粤，要么“无解”，要么“小解”；跳出粤做粤，不仅“有解”熏而且有“大解”。

猿援对立求解，解在对面

试想，一个人眼睛看不见了该怎么办？惯性的思维是把眼睛打开。而事实恰恰相反，看不见了，在你眼睛前面再“挡”上一个东西——眼镜，结果则看见了。一个人耳朵听不见了该怎么办？惯性的思维是把耳朵撑开。而事实恰相反，听不见了，往你的耳朵里面再“塞”进一个东西——助听器，结果则听见了。一老翁腿脚走不动了该怎么办？惯性的思维是给他“减轻负担”。而事实恰相反，走不动了，给他“增加负担”——拐棍，结果则走动了。概括说来就是：“看不见，挡一个，看见了；听不见，塞一个，听见了；走不动，拖一个，走动了。”也就是说，对于很多问题必须尝试着从对立面去“求解”。在宏观上，过去，传统社会主义，搞“公有制”，其结果是“公有公有，全民没有”；相反，后来搞“私有制”，其结果是“私有私有，全民都有”。过去，就公发展公，其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客观效果是差的；现在，跳出公发展公，利用私发展公，即混合所有制，其结果则把国有经济搞活了。再有，关于如何搞活国有经济，后来也认识到，通过搞死部分国有企业才能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简之，“只有搞死才能搞活”。在关于利己和利他的关系上，我们同样发现：凡是从利他出发的最终都利己了熏凡是从利己出发的最终都利他了。在微观上，就企业而言，要想做大首先做小，要想做多（元化）首先做专（业化），要想务实首先务虚，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想不被别人打倒首先“自己打倒自己”。就为官而言，做廉吏者才能更富。这是因为，廉吏久，久更富。再有，聪明睿智之人，要用愚笨处理；威猛无比之人，要用怯弱处理；功盖天下之人，要用退让处理；富甲天下之人，要用谦恭处理。唯此，才能恒久。

源于有无求解，解在无面

“有”是从“无”中来的，即“无中生有”，这是中国道家的基本思想之一。无私成大私，无欲遂其欲，不争无与争，无为而无不为。总之，无为而治，这是大道。多年以来，笔者一直在给[illegible]班讲授《战略管理》，在课程结束时，本人送学员们两句话去玩味：战略的最高境界是没有战略，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没有管理。只有达到如此“状态”，《战略管理》才算真正“入门”。作为老板，其学习由低到高分为三个阶段：手中有剑——心中有剑——心中无剑。学有形之剑不如学无形之剑。有形之剑御三五人而已，而无形之剑则御天下。正如《倚天屠龙记》里张三丰向张无忌传授武功时要求张无忌“得意忘形”是一个道理：忘掉“剑招”，掌握“剑意”，以意御剑，千变万化。这是大道，大道无形。一般而言，可在四个层面上对某一问题“求解”，即：技—术—法—道。过去，我们重在技、术层面即“有”上“求解”，但这只是“小解”；现在，我们则应高度重视在法、道层面即“无”上“求解”，而这则有“大解”。师者，授业，解惑，传道也。“传道”应是为师的最高层次、最高境界。

二、解的悖论范式

我们常常发现：同一问题实际上存在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解”，在一定的假定（“假定”不假，下同）下，它们都对。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无用有用长寿，无用长寿

老庄之道曾讲，家中来人作客，主人宰杀不下蛋、不作叫（看门）的鹅给客人用，而会下蛋、会作叫（看门）的鹅则留了下来，此谓“有用长寿”。山林里的大树，栋梁之材先被砍去，弯曲之材则被留下，此谓“无用长寿”。

玩物丧志玩物养志

在生活中，一方面，“玩物丧志”大有人在，人们对“玩物”往往赋予贬义；另一方面，通过“玩物”修身养性，例如，从养花、养鸟中，人们可悟出人生、悟出社会、悟出大千世界、悟出大道。这里，“隔行如隔山”，但是“隔行不隔理”，可谓触类旁通，一通百通，融会贯通。

猴脑袋指挥屁股，屁股指挥脑袋

在实践中，一方面，任何人的行为都是一定思想支配下的产物，行为（屁股）是由思想（脑袋）决定（指挥）的；另一方面，任何人的言语（思想）都是被其“屁股”所在位置所左右：在中央“说中央话”，在地方“说地方话”，在部门“说部门话”，否则就是一个不合格的高级干部。

源自：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少数

在实践中，一方面，“少数服从多数”，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视为真理，并在决策中以“投票机制”加以实践；另一方面，“多数服从少数”，尽管人们很少谈及，但是作为真理同样存在。例如，政党组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制度规定和制度实践，其机理就是“多数服从少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解在上面”，上面往往不是多数而是少数。

缘自：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早已成为指导人们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金科玉律”。但是，在经过充分的分析，完全吃准、吃透某一投资领域的时候，则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收益最高。

还是：细节决定成败，战略决定成败

前一时期，关于“细节决定成败”还是“战略决定成败”的争论在管理学界沸沸扬扬。笔者认为，对于执行层而言，执行必须到位，“细节决定成败”；但是，对于决策层而言，理念必须到位，“战略决定成败”。也就是说，对于执行层而言，关键是“正确地做事情”；对于决策层而言，关键则在于“做正确的事情”。

死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在实践中，一些企业基于“民族情结”，推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发展战略；相反，一些企业基于“全球情结”，推崇“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发展战略。后者的代表，诸如国内的格兰仕、国外的可口可乐，等等。

愚在：富人多了，穷人变得更穷；富人多了，穷人变得更富

在一些地方，穷人之所以变得贫穷了，是因为当地的富人多了，这种情形和认识曾长期占据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同样可以发现，在一些地方，穷人之所以变得富裕了，是因为当地的富人多了：富人们开工厂、办商店，越来越多的穷人有了就业门路、有了赚钱机会。富人创造富人，如在南方一些城市，具有“老板效应”，一个老板的出现往往带动一批老板的涌现。

忽视：节俭带来富足，奢侈带来富足

节俭带来富足，大家已成共识。然而，发展实践表明：一个社会的进步往往开

端于奢侈品的生产。一方面，它集中了最先进的技术，最和谐的产品美学，最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品质内涵；另一方面，奢侈品会打破技术的极限，引致革新，从生产上创造就业岗位，从消费上刺激社会需求，从而不断创造财富，致使富裕程度、富裕品位越来越高。

员越穷越讲精神，越富越讲精神

战争年代、艰苦岁月，在物质上极端贫困的情形下，人们奋斗靠的就是一种精神；和平年代、富裕日子，在物质上走向小康以后，精神追求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强化了：越是在物质上富裕起来的人们，越是追求在精神上的高度满足。

以上情形若上升到哲学层面，其一般表述可有：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上，既存在物质决定意识的情形，更存在意识决定物质的情形；在对立和统一的关系上，既存在对立高于统一的情形，更存在统一高于对立的情形；在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上，既存在内部决定外部的情形，更存在外部决定内部的情形；在分工和融合的关系上，既存在分工高于融合的情形，更存在融合高于分工的情形。前者是第一种存在状态，后者是第二种存在状态。过去，受认识上的局限性，我们只承认第一种状态的存在，不承认第二种状态的存在；不仅如此，而且肯定一个否定一个，非此即彼。此即采取的是“一分为二”的思维范式。现在，在一定的假定下，同一事物可能同时存在第一、第二两种状态，此谓“第三种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第三种状态则代表了事物的全部状态。这是因为：第四、第五乃至第 晕种状态，都是第三种状态中阴阳两种成分在数量上的不同组合而已。正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什么讲“三生万物”，道理就在这里。此即采取的是“一分为三”的思维范式：把二看成三。由此可见，“第三态”则是“常态”。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情形，懂得后者叫“心灵开窍”，懂得两者叫“有大智慧”，懂得三者则叫“大彻大悟”，达此“状态”方可真正找到“人生之路”。这一流程可简化为：开心—开智—开悟—开路。

三、解的最高范式

员从一个正确答案阶段到多个正确答案阶段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思维范式中一直机械地认为某一问题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即“一个解”；而现实是，很多问题的解都是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宜，在不同的

假定下有不同的正确答案，即“多个解”。就好比在社会科学领域，过去总认为一加一只能等于二，永远等于二；而现实是，一加一等于任何数，包括零和负数。也就是说，没有唯一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有好多种。这里，一个问题不仅有对、错两类答案之分，而且在对的这类答案中，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就有多个。

从有标准答案阶段到无标准答案阶段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思维范式中总是主观地认为某一问题的“解”是有标准的，这一认识在在校求学阶段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踏入社会阶段，如果仍停留在寻求“标准解”的思维范式中就不够了。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往往是无标准答案，“非标准解”很可能是“最优解”或“常态解”。例如，同一问题可用三种思维范式“求解”：用昨天的理论指导今天的实践，用今天的理论指导今天的实践，用明天的理论指导今天的实践。它们分别是思维范式的过去式、现在式和未来式。这里，基于过去式思维，问题的解是标准的；而基于未来式思维，则问题的解是非标准的。一个人，如果思维能够超越标准答案进入无标准答案境界，则意味着这个人“悟”出来了，他的思维领域将有异常丰富的开拓、创新空间。可谓：非常人物—非常思想—非常行为—非常绩效。

从遵守游戏规则阶段到制订游戏规则阶段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思维范式中经常习惯地认为遵守游戏规则的企业是好企业，即“解在别人那里”，自己的解和别人的解“对上”就成功了。所以，总是扮演一个“求解者”的角色。客观地讲，这是企业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但这不是最高阶段，只能是“次优解”。达到最高阶段则是：“解在自己手里”，别人的解都要过来和你“对上”，这叫制订游戏规则，其扮演的是一个“造解者”的角色。这才是中国企业所要寻求的“最优解”。仍以企业为例，其发展可有三个阶段：一是显规则，在此阶段，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二是潜规则，在此阶段，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三是无规则，在此阶段，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无规则阶段就是自己制订游戏规则阶段，也是其发展的最高阶段。

综上所述，“解”是一个系统，包括：有解无解、小解大解、次优解最优解、一个解多个解、标准解非标准解、求解造解，等等；“解”有规律可循，但前提是：在有鱼的地方钓鱼，在有解的地方求解。否则，一切努力皆化为零不说，反而为负，亦即：努力越大，损失也越大。

北京与台北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比较：20%的差距或4年的滞后

——基于人民币与台币的现实购买力分析

顾海兵*

依据海峡两岸政府统计资料（如无说明，是指[illegible]年资料并为了简单易读做取整处理），台湾人均区内生产总值（[illegible]）是[illegible]万元（新台币），相当于[illegible]万美元；台湾非农业部门人均薪资[illegible]万元（新台币）；台北市[illegible]年人均可支配收入[illegible]万元（新台币），为全台湾最高，相当于[illegible]万美元（其中消费支出占[illegible]）。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llegible]不含台湾）[illegible]万元（人民币），按目前公开外汇市场汇率[illegible]折算，相当于[illegible]万美元；城镇非农业职工人均货币工资[illegible]万元；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illegible]万元，相当于[illegible]万美元（其中消费支出占[illegible]）。由于台北基本上完全城市化，北京则城乡相对独立，为增加可比性，两地比较实际上是台北居民与北京的城镇居民。在[illegible]万北京常住居民中，非农业居民大体为[illegible]。如果依此计算（按美元计算），台北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是北京的[illegible]倍多。但是真实情况真是如此吗？根据笔者在台北的实地调查，从人民币与台币的现实购买力观察，实际的计算与理论的逻辑相差甚远。大体可以说，北京与台北两地的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大，几乎在同一个数量级，最多有[illegible]～[illegible]的差距，或[illegible]年的滞后，也就是说按目前的发展速度（北京人均收入年增速在[illegible]～[illegible]，台北年增速在[illegible]～[illegible]），北京在[illegible]年后完全等同于台北（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来自抽样调查的人均收入与支出数据，因此[illegible]年[illegible]月完成的第[illegible]次全国经济普查不影响本文的分析甚至进一步支持本文的结论，但上述有关[illegible]数据已采用了最新数据）。

我们首先列出台北的与生活有关的部分价格（新台币，元，质量中等，规格普通，[illegible]千已由台湾的[illegible]克转为[illegible]克，非中心市区的偏远的文山区为样本，中低档市场）。

---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食品类：大米每斤 元 鸡蛋每斤 大蒜每斤 元 生姜每斤 元 大葱每斤 元 小西红柿每斤 元 葡萄每斤为 元 大虾每斤 鸡翅每斤 元 毫升的“台湾啤酒”罐 五花肉每斤 元 羊肉片每斤 元 碗牛肉汤面 元(小饭店)，碗红烧牛肉面 元(小饭店)，水饺 个 元(小饭店)，素蒸饺 个 (中等饭店)，馄饨汤 元(小饭店)，肉丝蛋炒饭 元(小饭店)，个韭菜锅贴 元(小饭店)，圆白菜 棵 毫升的 瓶酸奶 罐 毫升的可口可乐 升的酱油 升的大豆色拉油 升的葵花油 克汤圆 元 杯豆浆 元 元(小饭店)，杯绿茶 元 个煎饼 根油条 元

用品类 相当于 张对开报纸大小的台湾彩色地图 份报纸 元 自行车 (英寸，速，山地车) 号电池 (优质) 每个 元 把普通雨伞 元

交通类 地铁票价 (零售) 起价 南北全价 元(如果购买智能卡，可以打 折；岁以上老人可以打 折)，公共汽车起价 元 出租车起价 元(公里)、每 米 元，号汽油每公升

服务类：剪发 元 洗发 元 洗车 元 医院挂号费 元 打工时薪在 元

住房类：房价每平方米 元万。

公用事业类：水每吨 (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处网站)，电每度 (台湾电力公司网站)，煤气每度 (估计是方) (大台北区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根据笔者的粗略估计 (非中心区与中心区平均后)，台北市的价格 (新台币，元) 与北京市 (人民币，元) 相比，食品类大体是 元 倍 (食品类价格在饭店的一个特点是非线性，即低档食品价格与高档食品价格相对于中档食品价格倍数更高一些)，用品类大体是 元 倍，交通类大体是 元 倍，服务类大体是 元 倍，住房类大体是 元 倍，公用事业类大体是 倍。

考虑一下消费结构，台北市的消费支出中食品所占的比重 (恩格尔系数) 为 ，住房所占的比重为 ，医疗支出所占的比重为 (包括健保支出)；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北京市的消费支出中食品所占的比重 (恩格尔系数) 为 ，住房加水电燃料所占的比重为 (不包括购房支出、虚拟房租)，医疗保健支出所占的比重为 ；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 (使用面积)。

由此，按低位估计，台北市的生活成本 (新台币，元) 是北京的 倍左右；按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位估计，台北市的生活成本（新台币，元）是北京的 员圆倍左右；按高位估计，台北市的生活成本（新台币，元）是北京的 员缘倍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按中位计算，北京的 员元人民币相当于 员圆元新台币。这样的估计实际上没有高估人民币。我们再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计算看，根据笔者看到的材料，世界银行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不是 愿比 员而是 圆比 员按此计算，人民币对台币应该是 员比 员远。可见笔者这里的估计由于是北京与台北的对比，因此还是偏低的。

按照笔者提出的 员比 员圆计算，北京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 员缘缘万元，相当于台北的 员怨缘圆万元，也就是说相当于台北的 缘园豫多。但是，我们能不能就此说北京居民的生活水平只相当于台北的一半呢？不能。因为：

员援北京居民的人均收入在统计上相对于台北是偏低的。偏低 员园豫应该是可能的。大陆的统计质量由于传统意识、法制环境、社会问题、调查经费等原因，调查户往往有意无意倾向于少记漏记，这是公开的秘密。虽然笔者没有做深入调查，但从台北市的民风之淳朴、政府网站与百姓距离之密切、政府公务员服务质量之高来看，这点是无疑的。（笔者 圆园园缘年 员圆月 圆缘日前后多次就统计数据的含义给台北市主管统计的主任处打电话，均得到热情服务：主动给我回电话，迅速给我直接或间接解答问题。我所打的所有政府电话均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我所看到的台北人几乎都是："谢谢"不离口、微笑写在脸、常言"还好了"。甚至萍水相逢、三句话投机就热情邀你共进一餐，真让我感动、激动、热动。）

圆援由于没有计算自有住房的虚拟房租，北京居民的收入严重低估。估计低估 圆园豫。从北京居民的消费支出看，在人均居住面积 员园平方米（使用面积）条件下，其人均全部住房支出一年只有 缘园元，而其中租赁房房租更只有 怨园元，其余的是并不属于房租的住房装潢支出 猿园元、维修用建筑材料 缘园元。虽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北京居民的自有住房率已超过 苑园豫，这部分住房不需交纳房租，统计中的租赁房房租相当一部分是租赁公房。依据北京的实际，一个打工者一般要将其收入的 圆园豫左右用于租房。因此，北京居民的收入低估 员园豫是可以接受的。

猿援由于制度性原因、历史性原因，大陆的公款消费一直居高不下。北京作为首都，公款消费水平由于"跑'部'向钱"应该高于全国水平。北京中高档饭店之火暴路人皆知。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单位实物福利，如国有单位领导的职务性实物消费（公款支付衣食住行用的票据），公款旅游等。由于公款消费没有计入或很少计入居民消费，由此北京居民消费被低估 缘园豫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源援由于地下经济、灰色经济、黑色经济的存在（相对于台北应该更突出），比如

北京的黑车就高达 员缘万辆，远高于合法的 苑园万辆出租车，北京居民消费被低估缘豫也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仅以上原因就足以使北京居民的收入在现有统计数据基础上增加 源园豫 ~ 缘园豫是没有问题的。如此，北京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就不是统计的 员愿园万元，而是 圆园园园万元左右，按中位计算，相当于台北的 圆园 ~ 猿园万元，也就是说相当于台北的 苑园豫 ~ 怨园豫。

作为佐证，笔者也实地调查了一些台北居民的家庭。从家庭的住房数量与质量、家庭耐用消费品（不包括汽车）的数量与质量、家庭的实际消费观察，上述结论是可信的。

至于人民币与台币 员比 员园的形成原因，这大概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了，需要另文分析。总的原因应该是与各地区的人文与地理、传统与现实、内因与外因、市场与政府等有关。

但是，上述结论还有需要补充之处。

员、笔者所做的北京与台北两市居民生活水平比较是基于国内消费。如果是国际消费，则北京的收入只能按 源倍而不是 员园倍折算为台币。从这一点说，北京人的储蓄、北京人的国外消费力就可能高估了。这一点在主要是外地人进出的宾馆消费上表现得比较突出（笔者的一些台湾朋友也往往因为北京宾馆的高价格而简单地认为北京的物价水平较高）。

圆、笔者初步观察，由于近些年的大规模建设，北京人住房平均质量可能高于台北。

猿、北京人的平均生活质量（情调，和谐，政府与企业的服务）可能低于台北。台北人之与人为善让我吃惊。如果你在台北迷路，路人会热情地长时间跟你讲怎么走，甚至完全可以把你送过去。

源、台北的平均工作时间可能高于北京。一是全年休假的法定天数少于北京，一是法定工作时间不打折扣，一是加班时间长。北京的公务员数量与比重远高于台北，而北京的公务员工作时间少于台北。笔者在台湾政大，经常看到员工加班。

缘、台北几乎家家有车。台北的空间狭小，只有 圆园园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万人，远高于北京（员缘万平方公里，当然，这里也有不可比的地方）。

远、台北人的参政意识、参政活动要多于北京，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过，这类生活是不能由消费所涵盖的。

苑、台北的健保等福利（全民医保、几乎 员园园豫的自来水普及）、环境保护（垃圾的 员园园豫处理、资源回收达 缘园豫）等、各级教育的普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对公共

安全的处理、国际化的水平、收入的均等化等在人均和总体的意义上要高于北京。

愿我北京（员我远万平方公里，圆翻翻万人口）与台北（圆翻远平方公里，圆翻远万人口）的比较当然不等同于大陆（含港澳，猿员个省区市，怨我远万平方公里，员猿亿人口，城乡之间的相对分割，远豫左右的乡村人口）与台湾（猿员远万平方公里，圆翻翻万人口，远豫左右的农业劳动力）的比较。大体说来，北京的价格高于内地平均水平的幅度应该大于台北高于台湾平均水平的幅度。据笔者对有关学者的初步了解（因为时间关系，这次不能做实地调查了），由于台湾的面积不大、市场化程度较高，台北的最高价格与台湾价格水平较低的台南相比，差价的幅度不超过圆翻豫。由此，可以说台北平均价格高于台湾平均价格水平的幅度应该在员远豫左右。显然，这一幅度远低于北京。如果可能，可以进一步把内地每个省的生活成本与台湾的生活成本做比较。这需要另文分析。

当然，任何一种比较都不是绝对的，都是有局限的，本文所做的也仅仅是生活消费，仅仅是数量性的实证分析。这种比较也不应该是精确的，应该是粗略的。这是相当一些社会科学的特点，在很长时间里是见仁见智的，实践的检验不可能是短期的。

顺便指出的是，由于内地与台湾的差异，笔者不赞成学术界动辄把内地与台湾做直接比较，两者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做比较。笔者更趋向于把内地的某些省级区域与台湾做比较、把内地的某些市与台湾的某些市做比较，这样可比性强一些。

最后需要再次指出的是，目前公开市场上人民币与台币员比源显然是低估了人民币的币值。

我们手中的货币会不会变成贝壳？

——漫谈全球化中的国家战略和价值观

王松奇*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一本值得反复咀嚼的经济史学著作。在狗年春节期间，当我对它做第二次阅读时，又有了不少新的心得和体会。唐朝的魏征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白银资本》所提供的翔实资料中总结 [illegible] 至 [illegible] 世纪这 [illegible] 余年全球化浪潮中几大洲经济以及各民族国家的沉浮兴衰演进规律，其间许多事常常令人扼腕叹息，我常常想：郑和 [illegible] 年的航海为什么只持续了 [illegible] 年就戛然而止？为什么哥伦布 [illegible] 年发现美洲大陆和达·伽马 [illegible] 年绕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加尔各答的航海活动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起点？为什么工业革命在欧洲而不是当时的世界贸易最大顺差国中国发生？为什么非洲在当时的贸易盈余货币会变成一堆废物？

自 [illegible] 年鸦片战争至 [illegible] 年，在 [illegible] 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似乎已失去了自信，战败国的屈辱、割地求和、在连续 [illegible] 多年时间中用于支付鸦片货款和战争赔款的平均每年 [illegible] 万两白银的外流、军阀割据和内战、经济停滞及民生凋敝，这些最惨淡的色彩相交织，形成了这 [illegible] 年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全景图画。然而，有谁曾想到：早在 [illegible] 世纪，中国就已经成了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国家；早在 [illegible] 世纪，中国就成了第一波全球化中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

据我观察，在近千年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各国的自然禀赋特别是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导致各国经济发展出现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农业发达就能支撑较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增长速度快、劳动力多、兵源充分，就使得一国的国势趋于昌盛。中国自 [illegible] 世纪甚至更早就在世界经济中居于领先地位，其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拥有成熟的农业种植、灌溉等技术，辽阔的版图和庞大的人口数量。在发达农业的支撑下，手工业、商业及货币流通制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述的中国纸币流通和百人以上的公共浴池在当时世界国民经济和城市生活组织方面已足以令欧洲各国啧啧称奇。但令人惋惜的是，中国在公元纪年第

* 作者系中国社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二个千年的后半段并没有将农业经济发展的优势导向新阶段，即孕育出现代工业革命的历史阶段。

陈寅恪先生一直认为，北宋时期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发展方面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的巅峰时期。他所说的巅峰当然是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的综合指标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到了元、明及清朝的前半段时，中国依然充分具备了孕育工业革命的雄厚经济基础。当时全世界的经济竞争已明显呈现出美—欧—亚三足鼎立之势。而这种三大洲的交流又有着三项具体内容：(1)病菌和病毒的交流。其典型事例是欧洲人将感冒、天花等病菌、病毒传至美洲，导致美洲早期那些“绿色纯天然”因而缺少免疫能力的土著居民绝大部分被消灭。(2)基因交流。欧洲人把小麦、水稻、白菜等农作物传至美洲，又把土豆、红薯、南瓜、玉米、花生等作物带回欧洲进而传至亚洲，这些高产农作物的引入也是中国 [illegible] 世纪中国人口出现爆发性增长的极重要原因。(3)以白银资本流转为中心的物资交流。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最重要经济成果是后续的欧洲移民在美洲发现了丰富的银矿资源，银矿的开采和冶炼使得 [illegible] 世纪的欧洲国家最早尝到了全球化的甜头。它们把大量低成本的白银运回欧洲，并用于交换当时实行银本位制度的中国和印度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这些早期的国际贸易活动使得一些欧洲国家率先完成了国家原始积累，而当时欧洲比较昂贵的劳动力成本也促使英法等国家滋生了发展制造业的强烈欲望，因而，早期的工业革命首先在欧洲具备了市场需求前提。

有市场需求还要有国家战略和市场主体。国家战略能为生产力革命创造制度基础，市场主体则可以在生产力革命中扮演推动力量。在市场主体产生原因的分析中，我觉得美籍日裔社会学家福山的论点最具特色。他在研究早期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在欧洲而不是经济早已领先于世界水平的中国发生这个问题时提出：这与家庭财产分配制度有关。在中世纪，中国的家庭财产在父母一辈的遗产分配中总是按照大体平均的原则在自己的子孙中间进行，这虽然有利于孝道美德的流行，但却不利于对子孙们产生冒险创业刺激。欧洲情况则不同，欧洲普遍流行的是家庭财产的长子继承制，这样，次子以下的子女从青少年时代就必须做好独立创业的思想准备并在适当的时候去自主创业，这种家庭财产分配制度自然也会对全社会普遍形成冒险创业、创新的风气产生积极影响，因而也就能够顺理成章地为早期工业革命准备市场主体或新生产力代表者创造社会前提。

福山从社会学角度的分析自有他的新颖独到之处，但经济学家则另有看法。顾准先生在几十年前曾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角度

对早期工业革命为什么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发生给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是城邦经济，这种经济本身就有利于工商业的孕育和新型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同时期的中国经济是封建宗法经济，以农村为基地的地主是全社会的统治基础，强大的封建宗法关系天生就有轻工抑商的本质特性并使其能够摧毁一切有利于工商业者的民主诉求和政治愿望，这样，具有超稳定结构特性的中国封建法权关系就会形成压制新生产力发展的坚硬外壳，从而使得即使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的中国也不可能出现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也对工业革命为什么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发生做了一个独特的解说。他认为，欧洲人努力发明机器并引发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是欧洲的相对工资水平太高，而中国因为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因而很难出现以劳动工具改进和推广为基本内容的工业革命——这种解释倒也别出心裁。

最近一些年，国内许多经济学家都陷入一种“制度浪漫主义”的情境之中，他们用制度解释一切、分析一切，这倒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忽略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制度而不是那种制度；二是即使处于同一社会制度下，为什么国家与国家、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会出现巨大的绩效差异呢？中国早在公元 [illegible] 世纪甚至更早就在全球经济中居于领先地位，并在 [illegible] 至 [illegible] 世纪 [illegible] 多年中通过朝贡贸易体系和白银资本的循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但中国并没有在 [illegible] 世纪以后出现工业革命，更在 [illegible] 世纪中叶以后 [illegible] 多年的时间里成了受人欺凌的四流国家。阿根廷早就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并在 [illegible] 世纪初就以富庶闻名，人均收入居当时世界第 [illegible] 位，但由于国家领导者缺少宏图大略，在 [illegible] 多年的时间里碌碌无为，到了 [illegible] 世纪末期，不仅爆发金融危机并引致社会动荡，而且中央政府也到了要宣告财政破产的境地。在 [illegible] 世纪的 [illegible] 年中，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有不少国家即使无所作为，但只要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也可以变得十分富足，典型的代表是各个中东产油国。不过，富未必就强，这些中东产油国无论怎么富庶却远远称不上是强国。在当今世界上，真正的强国定义至少要具备由以下三方面内容构成：①经济总量、可持续的强劲经济竞争力；②先进的文化科技教育、全球化价值观；③以民族凝聚力及军事实力代表的政治影响力。

全球化时代的竞争是民族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制度等方面展开的全面发展竞赛，就像一个企业靠内部积累和狭小的市场永远无法实现跨越式增长一样，一个民族国家如果不把自己融入全球化、驾驭全球化，即使内部治理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